



(德) 沃尔克·博恩希尔 著
胡苏云 孙常敏 张康清 译

群龙无首

—— 转变中的西方社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德) 沃尔克·博恩希尔 著
胡苏云 孙常敏 张康清 译

群龙无首

—— 转变中的西方社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该书的中文版得到作者 Volker Bornschieer
授权, 归四川人民出版社所有。

责任编辑: 何朝霞

封面设计: 魏晓舸

技术设计: 何 华

群龙无首——转变中的西方社会

[奥] 沃尔克·博恩希尔 著

孙常敏 胡苏云 张康清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协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4 字数 310 千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3898-4/F·322

定价: 26.00 元

译者前言

近十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美国、日本和欧洲三足鼎立的核心国历经盛衰，由稳定繁荣走向波折重组。面对信息社会和新世纪的降临，崭新规范、行之有效而众所认同的世界秩序又尚未形成。世界将走向何处？未来世界格局将如何？

“群龙无首——转变中的西方社会”是瑞士苏黎士大学教授博恩希尔最新的一部力作。他通过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与技术风格两条线索，勾画并总结了与三次浪潮有关的各种社会模式：

在第一次浪潮中（1835—1883），自由主义思潮主导社会经济文化的所有领域，各国奉行经济上自由贸易和政治组织上的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的原则同时风靡于国际经济。第一次浪潮中的突出代表是荷兰，从技术风格看，钢铁、煤炭和铁路运输成为支柱产业，生产处于机床运用和发展阶段，形成流水线上的劳动分工，出现卡特尔组织。

在第二次浪潮中（1883—1932），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势力和帝国主义盛极一时，但却是好景不长，最终让对外开放对内民主统治的国家赶上超过。从政治经济体制看，民众政治参与增加，义务教育扩展，社会保障开始形成，而原有的贸易体制趋于崩溃。从技术风格看，形成以钢铁和电力为基础的电气化时代，机械化也取得进一步发展，劳动分工体系中流行的是泰罗制；现代公司开始形成，并通过兼并浪潮不断优化自身结构，出现了股票上市公司。

第三次浪潮（1932—1992）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新阶级合作——凯恩斯主义社会模式主导时期，经济中流行国家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纷纷建立形成，教育改革民权运动和妇女争取平等的运动接连不断；国家间贸易从自由贸易体系走向关贸总协定的签署，再发展成新保护主义和非关税壁垒的设置，最终演变为双边贸易战。这一阶段技术风格开始以石油和人工材料为主，进入汽车社会；随着超导光导等多种能源的出现和计算机开始普及运用，掀起了自动化浪潮，并出现全自动化；企业组织中更强调人性化，否定了机械的泰罗制；通过几轮新的兼并浪潮，跨国公司纷纷建立。

目前，我们正迈向信息社会，面临“地球村”时代的降临。世界经济三足鼎立局面中并非仅仅是日本为一足，而是整个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蒸蒸日上举世瞩目。今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主题是“Rising China”（崛起的中国）。从世界演变历史看，虽然充满了竞争的火药味，但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以及强权统治的逻辑并非历史主流。只有那些凭籍稳固适宜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技术发展优势的国家，才能立足于世界之林经久不衰。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指出，国家干预

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与本书中对福利国家模式的肯定异曲同工。本世纪末，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即将出现，欧洲将作为一个整合性更强的整体，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这将对全球的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本书有关模式的分析会有助于我们找到探索这种影响的线索。书中不仅对人类经济社会变化总趋势作了大手笔的概括总结，对构成社会基础的技术、公司制度、市场机制、国家作用、教育、社会权利分配和冲突等诸多方面均有精细的描述，内容涉及历史、经济史、制度史、国际关系、企业组织和管理，信息丰富，叙述简练，雅俗共赏。

本书翻译中得到了博恩希尔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何朝霞女士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协作，在此特表谢意。本书的导言和第一篇由孙常敏翻译；第二、三、四篇由胡苏云翻译；第五篇由张康清（王未、郭莉）翻译，肖黎春为此篇翻译做了大量的协助工作。我们希望此书能为各位读者带来有益的启迪和帮助。

译者

1997年10月于上海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西方社会模式	(1)
本书布局	(30)
第Ⅰ部分 独特旋律	
第二章 效率、公平、安全、权力四重奏	(33)
第三章 世界经济大合奏：竞争与保护	(59)
第四章 波折和周期的变奏曲	(82)
第Ⅱ部分 纽结和断点	
第五章 技术风格：从汽车社会到协同生产	(111)
第六章 政治经济制度的三次冲击波	(135)
第七章 涌动的社会冲突	(158)
第Ⅲ部分 秩序的重塑	
第八章 虚拟人格与经济权力结构	(201)
第九章 机会均等的神话	(225)

第十章 演化之路·····	(250)
第Ⅳ部分 殊途同归	
第十一章 趋同和差异·····	(279)
第十二章 日本的启迪·····	(305)
第十三章 显赫的成就·····	(322)
第Ⅴ部分 演变与竞争	
第十四章 西欧复兴·····	(346)
第十五章 一个新的社会模式的基石·····	(377)
第十六章 没有霸权的霸权条件·····	(400)

第一章 西方社会模式

问 题

在以往的几年里，人们目睹了西方和世界社会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从战后阶段到在 80 年代，历史发生了巨大的演变，在许多方面世界社会出现了急剧变迁，几十年来看似稳固事例的因素却在 80 年代末几乎分崩离析。

在 80 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日趋尖锐，这导致第三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广泛的贫穷和萧条，从而从发展的观点看得出 80 年代是“迷茫的年代”，对核心国而言，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技术演变和政治转折。

核心社会处于新技术风格形成之间和政治经济体制历经离散时期。在以往几十年形成的全球共识开始分崩离析，而新的框架尚未得到认可，从经济角度看，80 年代的特征是短暂的复苏继之以 90 年代初持续的萧条。

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盛行，80年代则是以熊彼得理论为主导，与战后霸主——美国经济相对下降相对照的是日本经济引人注目的蒸蒸日上；而且，经历几年的“欧洲一体化”，欧共体整合趋势在80年代初出现出人意的进展，作为第三世界的主导国家中国由于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其经济力量正在后来居上。

最后，对欧洲和世界而言最惹人注目的是1989年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全球两极对立的现象顷刻消失，随着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的结束，主导东欧各国的两个主要手段也随之消失了。

那些看似稳固的政治秩序几乎顷刻消亡，这种社会变迁中的持续不断的轰动性事例令人震惊，也给社会学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对80年代这些事件纳入历史考察范围内并提出合适的科学理论分析至今尚未形成。

社会秩序何以产生又如何解体？这些问题由于上述间断和革命性转变显得尤其重要，要进行一项令人满意的理论研究应该是将广泛的不稳定性嵌入西方社会的转变型态之中，像始于70年代持续至80年代的危机阶段，使社会机构难以得到迅速认可；同时，80年代的特点又是寻求多种方案，以后又变成是对“新事物”的认可。

社会转变寻求“新事物”的长期过程是本书的主题。所表述的理论将社会转变看作是社会模式的间断性演变，它引发着社会不同阶段长期的周期运动；因此，社会转变不仅被看作是持续的变化，而且是社会模式的一种间断过程。尽管新社会模式依赖于前一个模式，但它们对演变的概念及社会转变的间断性的陈述大相径庭。社会模式由于持续和深刻的危机而形成和建立，在它们

的发展过程中它们产生新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其解体并寻求新模式，因此社会模式可看作是社会转变的基本单元。

必须区别两种社会转变。第一种包含社会模式的展开，即在既定秩序内的社会变化；第二种是指秩序本身的变化，即包括社会生活、组织结构以及社会计划的转变的，我们称后一种社会转变为演变。

我们在此阐述的理论避免对下述传统问题作单方面解释：什么使社会融合？什么使社会进步？单方面的答案通常由战后社会学两个主导理论给出：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这两种理论主要的分歧是对于社会融合因素作出不同的回答，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而冲突理论则认为权力关系是社会实体整合的关键，两种理论在研究社会转变中作用极其有限。与这种“绝对主义”相反，我们的理论围绕从冲突到基本趋同，从基本趋同到冲突的循环转变，社会模式轨迹持续是从第一阶段的基本趋同转向第二阶段的冲突，但是要强调的是基本趋同的概念并不排斥在既定秩序内的任何不同意见和纠纷。我们的理论综合了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的各种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两种理论框架。正如塞默尔，利普塞特（1985）所指出的那样，冲突和趋同是同一社会进程中的两个方面，从这一观点看，夸大两种理论的差异是没有必要的。

论 据

本书将描述我们称之为冲突性演变理论的各种因素，这一理论的基本兴趣所在不是整个社会，而是社会模式——社会转变的基本单元。一般而言，社会模式包含当时基本一致的观点，以及

用于解决代表普遍意愿的主导价值观与来自既得权力阶层特殊需要这两者之间冲突的机构设置。根据我们的理论，社会结构是这种冲突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即追逐权力，追求效率（自我抉择和经济进步）和安全，以及寻求平等。另一方面，社会模式代表了这些原则间的妥协，基于这一背景，某种社会模式被看作是制造合法性，从而通过实现其基本价值观达到社会稳定。然而，由于主导价值观与权力利益之间的对立，这种状况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一旦建立了某种社会模式，它不能不作变化永久持续，并经历一种持久的轨迹，其特点是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和不平衡进程，以及基本趋同和异己。以下述阶段标志这一轨迹的节奏：形成、展开、饱和、解体最终衰败并由新社会模式所取代。

作为一种社会型态的西方社会

在使用西方社会这一概念时，我们是指在现存的由许多相似因素构成的世界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型态，特定的演变及其变化的种类和程度是本书的主题，然而“西方的”和“现代的”这些概念对所讨论的社会型态是不充分的用语。在世界社会结构中，西方社会所占据的位置被我们称之为核心国家，西方社会只是不该被遗忘的一部分，尽管总体并非本书的主体。据我们的看法，世界社会结构同样包含对立的反核心国家（到80年代末）、不同程度上依附于核心国家或反核心国家的半边缘地区和国家，以及边缘和依附地区和国家。为了清楚起见，比较合适的做法是以历史比较分析法开始分析这一组社会型态及其相互关系。而这一任务超越了我们的研究，因此我们只分析“西方社会”。

战后西方社会型态除了卢森堡和冰岛这两个小国以外，下面18个国家是战后西方社会的一部分：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

时、加拿大、丹麦、西德、芬兰、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就是我们接下来将比较分析的样本。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没有包括在内，因为它们没有具备战后总体的所有典型特征，只是在近期才成为西方社会的成员，以色列作为特例被排除在外，因为自 1948 年强行成立之日起便战争不断，而且人口中大部分并非诞生于本国。近期，又有些非西方社会荣升为核心国，除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台湾，像日本这种在世界社会结构中的升迁是很少的。

西方社会形态深深植根于欧洲，并扩及到北美。在 20 世纪下半叶，即日本在二战失败后又扩及到东亚。尽管早期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者有相当的成功经验——14、15 世纪的威尼斯，16、17 世纪的北荷兰——它基本在本世纪内局限于极其不同的欧洲环境疆域之内，直到 18 世纪，由于英国的领先地位和随后突破性的英国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适应能力，其他欧洲强国如果不想冒风险在此番竞争中失掉核心国的地位，就不得不接受这种先进制度。因此，1789 年的革命，乃至 1830 和 1848 年的自由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形态的形成。

从 1830 和 1848 年后扩展的西方社会形态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1) 市场社会及经济效率强烈而完整地展开，(2) 权力的政治分化。后者又有三个特征：a、在中心体系内没有地域权力的绝对垄断；b、不同的政治权力中心和党派存在于社会之中角逐同样的政治权力地位；c、政治统治思想包容非精英的合法化，即通过选举，非精英至少占据一个可能的领导席位。这种政治组织由罗伯特·戴伊 (1971) 的“多头政治”概念得到充分描述。

近来，由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分散化逐渐增强，“民主”成为流行词。

从革命的角度看，这一形态的历史性成功与权力的分散及反向权力的不同制度有关。约翰·K·加尔希雷思也强调了这一成功(1967)。此外，成功所产生的合法性得到了强化，并且产生学习这一型态国家的能力函数。

在边缘和半边缘地区，核心国的中心机构只能以不充分形式或缺损形式呈现。这与经济上及政治—军事上依附于核心国一样，同样是不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核心国情况则不同。那里作为这一地位前提条件的强大的国家工具，有效地抗拒着来自反核心国的压力，甚至成为其威胁。反核心国地位的基本条件是与核心国所声称的文化领袖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总而言之，反核心国立足的基础是对核心国成功基础的敌视。在战后世界体系中，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在四十多年内一直是反核心国的主要成份。然而，在非集中化的世界体系中，反核心是一种持续的社会现象。如现代进程中专制主义是对威尼斯、北荷兰和美国的反核心势力，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有可能形成新的反核心势力。

市场社会和政治权力分散是西方社会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素。加上宪法制度，它们代表了自1830—1948年以来历史上更新的基本社会契约。立足于这个基本点，从一般的指导原则出发，形成了政治经济上的主权国，并以特定方式相交织。在我们的理论中，社会模式是更新的社会契约，就此而言，我们同意拉尔夫·达尔伦多夫将社会契约作为历史及其论据的主题：“社会契约在社会冲突基础上重写，”这正与我们有关演进的冲突理论不谋而合。这一理论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和确定更新的社会形态的问

题，这种理论的两个特点将在下段作进一步说明：首先社会模式被看作这是文化结果；其次，竞争性世界体系被强调作为一种可选择的机制。

社会模式和文化

社会模式作为文化结果的概念将进一步澄清。如前所述，决定社会结构的原则——一方面是主导价值观，另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力——在社会模式中相互妥协，这种妥协缓和了主导价值观、普遍需求与特定权力地位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区分出四个不同的层面：

1. 基本价值观。与代表指导行为准则的评估性规范不同，价值观是指事物所处状态的评估观。可以说规范主导行动，而价值主导人类。在我们的理论中，基本价值观是指明文化体系的航标灯和指南针。这种人类学根深蒂固的中心基本价值观包括质量、效率（自我决定和经济进步）和安全。

2. 规范性理论。由于它是历史形成的，并能够决定正确行为的观点，所以它比基本价值观更具体和更具选择性。规范性理论解释基本价值观，倡导和转变它们成为主导价值观，在不相容的价值观间寻求协调，或通过评估来处置这一问题。规范性理论受文化力的影响，代表不同社会制度在社会领域设置规范性的指导，它们是竞争的结果，为一种现实而进行的斗争。区别规范性理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与不同事实理念激烈竞争而又稳定的阶段是可能的。

3. 行动蓝图。这些蓝图是制度含义中实际的处方，因此行动蓝图和制度规则可以看作一回事。这种制度规则不一定是通过规范准则所传送的普遍主导价值观所决定，它同样取决于权力利

益。行动蓝图反映了普遍价值观和权力利益之间的妥协。这种蓝图与主导价值观和权力利益越紧密地联系，既定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就越大——社会秩序合法性是我们理论的关键概念。

4. 行动方式。这包括社会惯例及随之展开的社会权力分配，它们可能由行动蓝图及特定权力利益决定。行动蓝图与行动方式之间的不一致包含了规范准则中的越轨行为，因而是非法的。

我将那些不同的社会模式描绘成社会转变中的量。在这些变量中，对于一种非持续性的、周期重叠的发展途径的想象，从历史理论的意义上说，不是一项受到重视的法则。在下面的论述中，将从各个方面分析自始至终对一种具体的历史体系中运动产生影响的那些社会力量。现代社会结构的开始，自然要比先前提到的三种模式落后得多，而且这个结局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是以萧条为特征的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观点。

前面提到相继出现的西方社会模式，它们自从工业化向其他大陆蔓延以来相继建立，并在各个阶段继续向海外扩张：美国和日本。因为这些社会模式以其连续的方式产生了显而易见的重大转折和新的开端，所以我也称之为更新的社会契约。围绕对社会契约中包容的冲突，它贯穿着现代西方的历史。相对来讲，社会成员的一体化范围经过一段时期后明显扩大，只是在凯恩斯的社会模式中才吸纳了绝大多数人。

文化和人类社会从一个角度看是完全不能分离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可能是可以分割的。这首先是指第一个角度，然后才是第二个角度。我们对于文化的概念包括的不纯粹是思想的要素、特征和内容的相互联系，而且也包括了物质化的手工艺艺术品、生活用品以及在文化方面创造的事实。将文化与社会结构对立起来的观点，只是在一种模式被看作现实化的情况下才会有意义。

社会模式的概念联合了这两个组成部分，所以模式作为文化作品就会处在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状态中。当然，如前所述，在一种社会模式的经历过程中，它的现实化具有不同的强度。在经历的第一阶段中，模式及其现实化更多地是处在平衡的状态。在第二、第三阶段，模式及其现实化之间就会产生不断的冲突，这一模式就会以其合法性而确立的内涵渐渐消失，然后自我灭亡。

这里所指的模式与现实化发生冲突的过程是一种双重矛盾范围内产生紧张关系的来源。另一种来源在于，一个模式可能仅仅是一种妥协。互相矛盾的原则，或者说即将出现的矛盾本身，在某种模式中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从社会成员的角度承认某种社会制度，从下面所述的角度看是有意义的。合法性的范畴取决于模式与现实化之间的一种微妙差异。撇开这一点，进一步看，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为了调和机构性层次上的互相冲突原则和潜在地包涵全体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模式更大。这种一体化愈狭隘，合法性也就愈狭隘。

人们从狭义上理解的文化，是在某种模式中现实化了的文化，是在专门塑造的和互相联系的机构中确定下来的文化，另外，当然也还有在模式交换中同时作为社会内在意义结构而存在的东西，此外，在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大转变后，出现了第一批对凯恩斯社会模式中机构形态的理论描述。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和社会却又互相排挤。很明显，这是针对结构构成的原则而言，这在第二章里将更详细深入地进行论述。因为文化的来源处在人的思想当中、在思想的传递和由此产生的事实当中，所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化是对思考过的内容、传递交流过的内容和实现了的内容作出整体回忆。一个以其特殊文化而存在的社会，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仅仅是社会中